

·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

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教育

冯建军^①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拥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如何通过价值教育促进价值认同,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人类共同价值不是普世价值,也不同于狭隘的国家价值,它以尊重国家、民族价值为基础,是建立在价值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性、统一性。人类共同价值教育必须把教育视为全球的共同利益,既要进行人类基本价值教育,又要进行国家、民族价值的多元理解教育,既要进行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全球责任意识教育,也要进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教育。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共同价值; 价值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8)01-0001-08

The Value Education towards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FENG Jian-jun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o buil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it needs the common value of human identity. Therefore, how to promote value identification through value education is a project to be carefully studied. The common value of human beings is neither the universal value nor the narrow national value. Based on the respect of the national value, it's the commonality and unity beyond the diversity of value. The common value education of mankind should regard education as the common interest of the whole world. It should carry out the basic value education of human beings as well as the multiple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of national valu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between countries and between people, and also to carry on the value education of harmonious symbios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basic value of common human destiny; value education

^① 收稿日期:2017-12-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880008)

作者简介:冯建军(1969—),男,河南南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道德教育研究。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生存的自然共同体,又是一个合作的建构共同体。按照阿德勒和巴内特(E. Adler & M. Barnett)的观点,共同体具有三个特征,即共同体内各成员国拥有共同的认同和价值观,成员国之间能够进行多方位的直接互动,共同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互惠和利他主义。^[1]依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有共同利益的需求,更需要人类拥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如何通过价值教育促进价值认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价值都有一个主体,即“谁”的价值,满足“谁”的需要。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它超越单一的民族、国家和社会,反映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共同需要,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反映。因此,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以人类共同体的出现为前提。人类共同价值既是新全球化时代文化趋同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政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1. 新全球化时代价值趋同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人的思想、观念的产生,离不开对其社会关系的考察。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西方抽象人性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下面我们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的理论,来历史地分析人类社会中的共同体状态及其价值诉求。

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种形态是人的依附关系,马克思将其概括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其表现,一方面是对自然的依附。原始的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生存主要依赖大自然的赐予,人与自然保持一种天然的一体化。另一方面,人对人的依附。最初是通过血缘、地缘关系而自然形成的,表现为“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3]。这种原始共同体称为“血缘共同体”。在原始共同体中,“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4]。原始共同体中,只有共同体的利益,没有个人的利益,共同体是

自发地天然形成的,不是自觉形成的,共同体依靠的是血缘和地缘关系,无须共同价值的引领。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的依赖关系逐步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它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仅继续依赖自然的赐予,而且为丰富自身发展的物质条件而自觉地改造自然。正是因为人对自然的改造,人获得了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彰显了人在自然面前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人对自然的改造使个人获得了独立的物质基础,加之商品经济的趋利性,激活了个体占有更多剩余产品的欲望。人类由此陷入了“人对人是狼”的普遍战争状态。“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5]因此,近代社会的共同体是“虚假的共同体”。如果说有共同价值的话,也是强势国家以自己的价值迫使弱势国家接受。这种价值不是人类共同价值,而是以普世价值为幌子的强势国家价值,它排斥了世界文明和价值的多样性,强制其他国家遵循唯一的价值,由此导致了文明和价值的冲突。

近代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6]。生产力与分工的发展,使得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突破了彼此隔绝的民族和地域界限,人类社会交往日益普遍化,“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这种转变最初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国家之间是一种对立而非合作的关系。这可以看作是早期的“旧全球化”。“当今时代,人类正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7],不仅全球交往更加便捷、更加密切,而且改变了以往交往的性质。交往不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人类真正成为一个相互关联、休戚与共的“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一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地与全人类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新全球化时代的公民必须超越过去那种封闭的、狭隘的局部利益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超越“小我”意识,突出不同国家、民族间的“共在性”与“一致性”。

全球化源于经济,但不只是经济全球化,还有文化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不只是尊重文化多样性,还要看到文化的趋同与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发布的《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

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指出：“即使在纷繁复杂的文化多样性之中，也有统一性存在”^[8]。这种统一性不是普世价值，而是基于文化多样性的共同价值。普世价值坚持一而排斥多，共同价值是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强调价值多样性中包含着统一性和共同性。全球化使人类的共同价值正在变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引领人类发展新的价值秩序。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确定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其会议决议之中。201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全球化无疑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客观要求并为之提供了可能性，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全球化的自然结果，它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建构。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界定为“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之后，十九大报告更多地指向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即“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9]。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全球合作的共同利益诉求，也不只是包容互惠、和而不同的新型国际关系，其中蕴含着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兼容并蓄观、全球治理观等等。只有自觉地坚持这些全球价值观，才能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经济共同体，包容互鉴、和平共处的政治共同体，兼容并蓄、共同繁荣的文明共同体，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共同体。

人类共同价值基于各国共同利益、人类共同福祉，是对人类共同体共同利益的反映。“共同利益概念超越了公共利益的辅助性概念。后者将人类幸福局限于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从‘共同利益’的

角度看，重要的不仅是个人的‘好日子’，人类共同拥有美好生活也很重要。”^[10]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不仅有利益的共同，还有精神的、价值的共享、共有。共同体不只是利益的交换，也是人们心里的期待和精神的共在。因此，共同体中不仅有利益的共同体，也有价值的共同体，这意味着共同体中价值趋向统一，逐步形成人类的共同价值。

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共同体之所以是共同体，就在于它有共同的价值观。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即便因为某种利益而结盟，但由于这种联结骨子里是为了个体的利益，充其量是个体利益的集合。一旦个体利益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必然威胁共同体的存在，甚至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之中，导致共同体的瓦解，国际社会尤其如此。“在世界多元化的发展中，各国越来越需要价值共识以求得共赢。价值共识不是脱离各个民族的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共识，而是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的对某些基本价值的认可”^[11]。正是基于这些价值共识，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人们才通过普遍的交往而凝聚、团结在一起，才能组成和谐、有序、稳固的人类共同体。

二、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发展需要价值引导，否则就是无序的、混乱的，也谈不上共同体。但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从前面的回顾看，原始阶段人类只有共同体的价值，没有个体的价值，个体为共同体所奴役。近代社会，个体价值意识觉醒，但这种意识是孤立的、单子式的，因此，只存在着试图支配他人的价值，各种价值主体之间处于一种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地位，甚至是极端的对立状态，文明的冲突由此而起。全球化时代，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共处一个世界，合作共赢是必然要求。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自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国家间、民族间、地区间、企业间、家庭间、个人间的和谐互助、共生共利共荣，以人类文明幸福发展的可持续为使命，建立起社会利益互惠机制”^[12]。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出现在全球化时代，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条件，就在于人类有共同的利益。只要有共同的利益，就必然有共同的价值。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追求的共同利益的体现。

共同利益不同于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集，是人人共享

的利益。公共利益虽然改变了个人利益的性质,但其本质来源于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是个人对其利益的部分出让。在公共利益中,个人之间是一种协商关系、契约关系。公共利益没有把人與人联结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共同利益超越了公共利益的局限性。“共同利益不是个人受益,也不是狭隘的善意”,共同利益是“人类在本质上共享并且互相交流的各种善意”。^[13]这是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善意,不仅仅是个人美德的简单累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机械的叠加,而是作为一个超越国家、民族利益的整体而存在,是为了人类共同福祉的价值诉求。

共同价值不是普世价值。任何价值都具有自己的本土性,纯粹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但任何特殊的价值都具有这个时代的共同性,都具有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和希望。因此,各个民族、国家的价值都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普遍性,这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所谓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西方把自己的价值鼓吹为全人类的价值,以普世价值为幌子在其他国家强制推行。普世价值把各种价值视为对立的,因此排斥价值多样性。共同价值是建立在价值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性、统一性,各种价值之间是平等、共在的。普世价值以西方价值为制高点,唯我独尊,把西方的价值视作世界唯一或者最高的价值。共同价值秉承差异平等、包容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普世价值推行一种文化霸权、价值强权,目标是西方中心论。而共同价值是多元价值的平等共存,其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4]

共同价值超越了某一特定国家、民族的价值,但它不是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的价值,而是基于国家、民族价值之共同性的价值。所以,人类共同价值不仅不排斥国家、民族的价值,相反,还需要以它们为基础。共同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价值既具有本土性、特殊性,也具有共同性、普遍性。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主义只讲价值的本体性、本土性,走向价值相对主义,是不可取的。但若以共同价值取代一个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同样也是不可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真正的共同体”状态,它既代表了特定国家、民族的利益,也代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因此,它既要讲人类共同的利益,又要讲不同国家、民族的核心利益,既要讲人类的共同价值,又要讲不同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15]人类共同价值就是面向人类的共同发展、共同利益,在国家、民族核心价值中求同存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的核心价值,反映了国家的核心利益。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的共同价值并不矛盾,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全人类怀抱的和平与发展愿景是一致的。因此,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排斥人类共同价值,同理,强调人类共同价值也不排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同样也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6]。习近平主席站在全人类利益和发展的制高点上,提出了人类共同价值,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这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借鉴和吸纳了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全人类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的升华和具体体现。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反映了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特点,又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作为自己的重要航向,彰显人类意识、全球视野,显示了中国人民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责任担当。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教育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的生活包含着价值,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教育都包含着价值教育,也可以说,教育就是价值教育。但这样说,也未免把价值教育太泛化了。价值教育固然要渗透在所有教育中,但也需要专门化的内容和领域。专门化的价值教育需要以特定的价值内容为对象,引导学生认识、认同特定的价值,并在生活实践中践行之。本文所说的价值教育,指的就是专门化的价值教育,是培养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认识、情感和行为的的教育。

人类共同价值不同于单一的普世价值,也不同于狭隘的国家价值、民族价值。因此,人类共同价值教育不排斥国家价值,也不排斥民族价值,它以尊重国家、民族价值为基础。只有这样的人类基本价值教育才是尊重国家、民族价值的教育。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教育,既要进行人类基本价值教育,又要进行国家、民族的价值教育,既要进行人与人之

间社会价值的教育,也要进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教育。

人类基本价值教育既有形式,也有内容。从形式上看,人类共同价值教育必须把教育视为全球的共同利益,参与全球共同的教育治理。在全球教育中,通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开展全球范围内普遍的、充分的国际交往,才能生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从内容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教育,包括人类共同价值的教育,民族、国家多元价值的理解教育,全球公民的责任意识教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教育。

1. 人类共同价值的教育

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不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依据的,而是在人类交往实践中形成的。西方学者提出的普遍价值基于人性之普遍性或者人生幸福、美好生活等,虽具有积极意义,但它是建立在抽象人性基础上的,缺少实现的社会基础。人类基于物质生产实践的普遍交往结成为一个共同体,这才使价值共识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实现的可能。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六种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和平、发展”反映了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公平、正义”反映了人类的社会价值观,“民主、自由”反映了人类的政治价值观。

第一,“和平、发展”是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和平是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因为没有和平就无法生存或很好地生存。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但面对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对国际格局的长期负面影响,面对世界前途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面对地区争端此起彼伏,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蔓延,世界不会自动地实现和平,和平需要我们去争取,更需要我们去维护。维护世界和平不能诉诸武力,“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热衷使用武力,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道义贫乏、理念苍白的表现”^[17]。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平创造了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怎么发展?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表了《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的讲话,提出世界各国要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性质上说,这种发展是包容、平等、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公平、正义”是人类的社会价值观。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公平的精髓,即“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2015年,习近平主席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正义有个人正义和国际正义。个人正义在于合理分配个人间的权利和利益。国际正义是处理国际事务时协调各参与国利益和责任的基本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又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18]。国际正义关注人类世界的均衡发展 and 共同责任,谋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第三,“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政治价值观。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民主即不能是一个国家说了算,一个国家独断专权。世界的问题必须由世界各国协商解决、共同承担责任,世界发展的成果也应由世界各国共享。因此,民主是解决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寻求人类价值最大公约数的重要手段,也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准则之一。^[19]自由意味着包容和尊重,特别是尊重各国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这种自由让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去享受更为普遍的发展而又不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发展甚至生存为代价。

上述六个方面的人类共同价值,相互制约、互为一体。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和民主、自由的政治价值,都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这种和平、发展超越了国家的疆域和界限,就是要各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2. 民族、国家多元价值的理解教育

当然,承认人类共同价值,并不意味着否定各个民族、国家自身的独特价值,人类共同价值是建立在承认彼此特殊价值基础上的。价值是基于文化的,是文化的核心构成。文化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交往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不同民族、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文化多样性构成了人类不同群体和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精神象征。一个民族、国家文化的解体,足以使这个民族和国家消亡。所以,世界各个民

族、国家都积极维护自己的本土文化。文化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20]。所以,每个民族、国家的文化都具有平等、独立存在的价值。作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以人类共同价值取代民族、国家价值,而是要承认和尊重各个民族、国家的价值,包括尊重各个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传统和信仰,尊重各个民族、国家、地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的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21]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教育。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多元文化、多元价值教育承认文化和价值的多元、多样,拒绝文化沙文主义和价值霸权主义,“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2]。每个民族、国家、地区既要珍惜、维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也要承认和尊重他人的文化、价值。只有相互尊重、相互承认,各种文化才能共在、共融。

人类同住地球村,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使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融合包容,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平相处,合作共赢。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的主题是“为和平、人权和民主的教育”,就强调教育“要有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接纳的精神”,这就是多元文化、多元价值教育。

因此,多元文化、多元价值教育,要基于各民族、国家自己的核心价值,但不能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核心价值。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核心价值,强化自己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而排斥其他,容易导致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有民族、国家各自的利益,又有共同体的利益。因此,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教育,必须走出狭隘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状态,更不能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而必须把民族、国家的利益融入到世界之中,把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融入到人类共同价值之中,构建一种开放的、包容的、互赏的多元统一的价值体系。多元文化、多元价值教育,重点不在于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而在于“多元”价值教育,在于对不同民族、国家核心价

值的尊重、包容、互鉴、互赏,开展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交往、学习、对话与合作。

人类共同价值教育不排斥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但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优先性。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共同体的底线价值,反映了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和人类基本利益。人类共同价值是第一性的基础价值。来自不同国家利益、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是第二性的价值。第一性的价值是普遍的,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需要和保证。各民族、国家的价值是该民族、国家特殊利益的反映,这种特殊利益应以不违背人类共同价值为基本要求。人类共同价值,既是共同体繁荣和人类福祉的条件,也是每个民族、国家维护自己利益的条件。每个民族、国家的成员,既基于第一性的基础价值的实现,也基于第二性的民族、国家价值的实现。民族、国家的成员一方面通过共同价值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自我价值贡献于人类的共同价值。因此,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教育必须面向人类共同价值,只有这样,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才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才能避免走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误区。

3. 全球公民的责任意识教育

共产主义,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最高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现实选择。^[23]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既有国家的利益,也有超越国家的全球利益,二者交互在一起,相互制约。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个人,既属于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又超越了国家利益的局限,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地球公民,“全球化创造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型经济、社会和文化空间,正在促成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新的公民身份认同和动员模式”^[24]。国家公民局限于本国的利益,认同本国的核心价值;全球公民则认同人类的共同价值,维护全球的共同利益。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不存在纯粹的世界公民、全球公民,国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每个公民首先隶属于特定的国家,但又必须超越国家的狭隘利益,具有全球的利益、全球的视野。这就超越了单一的国家公民身份,赋予公民以全球公民的新身份。教育应立足于培养具有世界视野、能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的世界公民。

在面对人类共同利益时,不仅有人类公共福祉,也有共同面临的问题,诸如生态恶化、环境危机、恐怖主义、人口增长、贫穷问题等等。面对全球化带来

的种种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因此,各国人民必须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发展共同负起责任。这就需要进行共同体的责任意识教育。基于“全球共同利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育要“促进全球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团结”。首先是与当地及国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共命运的意识,以及全人类休戚与共的精神;其次,通过了解地方和全球层面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的相互依存关系,认识到社区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三,个人对社区的责任意识,承诺参与地方、国家及全球层面的公民行动和社会行动。^[25]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合作共赢。人类社会的公共福祉和共同面对的问题,把人类紧紧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培养共同体成员——全球公民的责任意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首先也要求世界各国对自己的发展负责,不因自身的发展而损害他国或人类的发展,要放弃博弈和零和思维,强化世界各国的团结意识。人类不会因为全球化而自动联结成为共同体,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这就是世界各国对人类发展的共同责任和团结。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教育

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多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国际关系等等,涉及的都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赖以存在的自然基础——我们共同生活的生态家园。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前提是“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地球”,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唯一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6],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而且是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之所以需要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起,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有着共同的利益,还因为我们面临着共同的危机。危机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回顾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原始社会,人依赖于大自然的赐予,人折服于自然、敬畏自然。但近代以来,人不断地改造自然,这种改造甚至违背了自然规律,超越了自然的承受能力。人类对自然的肆意开发和伤害,最终导致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伤及了人类自身,

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气候变暖等。这些问题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就要重新审视生态伦理理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27]。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构成了人类共同价值的一部分,它是人类共同生态利益在价值观上的体现。

要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秉持这样几个基本要求:第一,树立天人一体的观念,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8]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摒弃人类中心论的思想,寻求永续发展之路。第二,绿色发展观。绿色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大理念之一。传统社会的发展以经济为中心,但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导致经济发展了,环境也破坏了。新的发展理念提出“绿色”发展,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第三,可持续发展观。人对自然的破坏,已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的“核心关切问题”。^[29]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只局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可持续发展,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它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可持续性的最新定义是:“个人和社会在当地及全球层面采取负责任的行为,争取实现人人共享的更美好的未来,让社会正义和环境管理指导社会经济发展”^[3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促进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教育,“教育将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关键”,赋予了教育以新的任务,即“促进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观”。^[31]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它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与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3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真正共同体的当代形态。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人与人之间的多元共存、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共赢,从而不断朝着人与自然、个体与类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而努力。

参考文献:

- [1] ADLER E, BARNETT M. Security Communities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30-31.
- [2][5][6][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571,566,185.
-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3,126.
- [7] 袁祖社.“共享发展”的理念、实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建构[J]. 南京社会科学,2017,(12):47.
-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 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M]. 张玉国,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2.
- [9][18][22][2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5,59,59,59.
- [10][13][24][25][29][30][3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M].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科,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70,69,57,58,12,12,24.
- [11] 杨宏伟,刘栋.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性”基础[J]. 教学与研究,2017,(1):93.
- [12] 2015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正式启动[EB/OL]. <http://www.rmlt.com.cn/2014/1224/363838.shtml>.
- [14][15] 韩庆祥,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同价值[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7,(4):5,14.
- [16]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09-29(2).
- [17]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 光明日报,2014-06-29(2).
- [19] 秦宣,刘鑫鑫. 共同价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4): 41.
- [2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59.
- [21]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 人民日报,2017-01-20(2).
- [23] 杨宏伟.“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路径[J]. 理论学刊,2017,(2):17-22.
- [27] 罗树武,赵志阳.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与人类共同价值追求[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747.
-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39.

(本文责任编辑 曾伟)

来 稿 须 知

本刊自2001年起,执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标准,请作者来稿注意如下事项:

1. 来稿请附100—300字的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以及作者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工作单位、通讯地址请使用全称。
2. 请作者提供个人简介:出生年、性别、籍贯、职称职务、博士学位(按十三大学科门类标明类别)以及研究领域或方向。
3. 文后参考文献应著录准确、完整,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式如下:
 - (1)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起止页码.
 - (2)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J]. 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 (3)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原文献主要责任者. 原文献题名.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 (4)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N]. 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